真的规范性/叙事学向度

曾千里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摘要：真除了事实性和真理性之外，还具有规范性的向度。真带有叙事学的特征。最后，本文尝试提出一个观点：我们之所以难以达到完满的真，是因为实在的非线性和我们的叙述的线性本性。

关键词：真 真理 规范性 叙事学

明确提出事实和规范/真与价值/是和应该 de的，是休谟和韦伯

而在另一些哲学家那里，真本身就是带有规范性向度的。在柏拉图那里，感性的世界是虚幻的，理念的世界才是“知识”的对象；在西田几多郎那里，有真和意志的同一，海德格尔的主客未分的所谓“原初状态”（而且海德格尔是反对真的符合论（知与实同一），认为“符合”是流俗的观，“真”是敞开的，在“澄明”中，例如艺术品的真理，这是沿袭着胡塞尔的看法，不止命题可以谈论“真”，名称等也可以谈论“真”，虽然胡塞尔本人是符合论（《逻辑研究》开篇第二句话））一直以来，真除了真理性/事实性的一面之外，还关涉规范性，即真不止关于“是”，还关于“应该”。真与善（good）、与美，一直以来是难以分割。让我们想起济慈那著名的诗行：

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 – that is all

Ye know on earth, and all ye need to know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

这就是你们在地上所知道和需要知道的一切。[1]

柏拉图以降的真的规范性传统，普遍性和持续性是重要的标准。变动不居的不仅是不好的，而且是虚幻的、假的，而只有持存不变的才是真的[2]；在黑格尔那里，“真”永远是未完成的状态[3]；在海德格尔那里，对真理的探索是一种“解蔽”（Entbergung），可是解蔽本身也是一种“遮蔽”（Verbergung）[4]，而真理是存在物对存在的“敞开”（offen），是发生在一个“澄明”（Lichtung）的场域里的[5]。在海德格尔那里，并没有什么“事实”这种东西。而我们要说的是一句话很好地总结了这一立场：“但在我们看来，这种真实仅仅在于他不假。” [6]

这应与真理论中的真的命令式的规范性区分开来

这是与事实与价值、事实与规范、是-应该的二分截然不同的，韦伯；休谟

这时候我们就能理解黑格尔以及一系列思想家为什么处处言说“矛盾”，当事实与价值、真与意志并不分离的时候，人世间充满了矛盾。

让我们回想起那个经典的谬误吧，“真正的苏格兰人”，当我们在说真正时，我们在说什么呢？

我要谈谈的是真的叙事学特征，这部分地来源于我们不仅谈论的是facts，还有Relations between facts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客观性”是个很大的问题,笔者在此只能作简单讨论。在历史学领域中,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主张历史学应“如实地重构过去”，即科学的历史是对过去的客观描述。他的观点被称为“客观主义”。

与此相反,不少学者强调历史研究是选择性的（selective）与评价性的(evaluative)，这二者都是依赖于价值的。而“客观性”是独立于价值的(value free)，因此历史研究不可能是客观的。他们的观点被称为“相对主义”。相对主义的论证主要有:首先,历史的主题是价值负荷的(valuecharged);其次，历中学家在建构历史时的题目选取是价值引导的(valueguided)。这两点构成了“相对主义的源泉”（the fountain-head ofrelativism)

Dray W. Philosophy of History. Upper Saddle River: Prince-Hall, 1964: 23-24

长久以来，我们谈论真理就好像有一个客观的、脱离了视角的事实在那里等着被我们谈论。就像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例如，当你被人追逼，你僵持不动也是一种选择，你不能突然跳脱时空，抽身事外，只是我们平常并没有那么紧迫，我们可以花大长时间思考，仿佛时间静止了一样，所以这一事实被掩盖了）一样，所谓“冷静的”“客观的、第三方”的叙述也是一种叙事方式。我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还有一个叙述方式/叙事的问题。在海登怀特那里，黑格尔的历史是反讽的，米什莱的历史是一部浪漫剧，托克维尔的历史则是悲剧的，布克哈特的历史是讽刺剧，马克思的历史是转喻模式的，尼采的历史模式是隐喻的，等等[7]。不过我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另两个角度。艾柯在《悠游小说林》中说：“我注意到生活一定更像《尤利西斯》而不是《三个火枪手》，但我们通常用《三个火枪手》而不是《尤利西斯》的方式去思考生活。”([8], p. 123)无论《三个火枪手》的故事有多么浪漫离奇或偏离历史，它的叙述方式是线性的、条理有序的，而正像艾柯说的那样，我们的生活与意识是杂乱无章、混乱不堪的，我们受到我们潜意识的支配，我们的思绪，就像伍尔夫说的，“《论现代小说》

......让我们按照坠落的次序记录下那些落到心灵上的原子，让我们去追踪那表面上是极其无关联、不协调的模式，这些模式把每一个细节或情景都纳入其有意识的麾下。让我们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生活中公认为是重大的事物要比公认为是渺小的事物更为有趣味的事物显得更为丰富多采。

......”

在Don Garrett deals with a basic and familiar problem in the Ethics: on one hand, Spinoza asserts that minds and bodies are identical; on the other hand, he also claims that they possess completely different properties (thought and extension). This appears to violate a principle that many of Spinoza&apos;s readers regard as obviously true, the indiscernibility of identicals: if x and y are the same individual thing, then they possess the same properties. While others address the problem by explaining how Spinoza can avoid violating the principle, Garrett proposes that Spinoza rejects the indiscernibility of identicals, or, at least, that Spinoza only accepts the principle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John Morrison also concludes that Spinoza rejects the indiscernibility of identicals. Morrison shows that this conclusion solves other problems, for instance, explaining how a mind can be identical to the idea of the mind, even though they represent different things: the mind represents the body, whereas the idea of the mind represents the mind. But Garrett goes even further: he also argues that Spinoza does not accept the principle of the transitivity of identity, which is similarly difficult to square with Spinoza&apos;s claims that the attributes are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yet also identical to the one substance.  
  
But what would motivate Spinoza to reject a principle that many readers have considered to be self-evident? Garrett cites two motives. The first is strong ontological pluralism, which Garrett takes to imply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of being (as thought and as extension), rather than merely different beings. If an individual can exist in different ways, then it must have different properties. Interestingly, Garrett sees this commitment as Spinoza&apos;s development of Descartes&apos; view that formal and objective reality are two different modes of being. The second motive is the adequate-ideas conception of truth, that is, the view that all and only adequate ideas are true. According to this view, truth is not merely a matter of correspondence between ideas and things, but also requires that ideas represent things completely, as adequate ideas do. It follows that true ideas must understand things through their peculiar way of being: bodies must be understood through extension, and ideas through thought. Consequently, we can never truly conceive of a body as thinking or of a mind as extended. Since the indiscernibility of identicals would imply precisely such a conclusion, the adequate ideas conception of truth provides reason to reject it.

例如，纳粹对国会大厦着火事件的编排，即使其中每一件事实都是真的，我们也会认为它并不那么真（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例如，在生活中，一个人或一家媒体就算不撒谎，ta也可能会隐瞒信息，或添加无用的信息，或是作不恰当的对比，等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一部小说，即使它是虚构的作品，可是却比由真话堆砌而成的谎言要真。雨果在《九三年》中对马拉、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的密谈的描写[9]，尽管绝不可能是真的，尽管有戏剧的夸张，却很好地契合了三个人的性格，更重要的是，使人感受到无以伦比的启发，狄更斯的《双城记》中对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ancient regime）、绝对王权（absolute monarchy）、贵族的腐败堕落和法国大革命中的暴民政治的揭露[10]，等等。这种虚构的真实，它给我们一种总括式的、具有高度代表性的印象，将我们从纷繁复杂的琐屑和历史的迷雾中抽离出来，是一种启发式的（heuristic）真实。正像是毕加索所说的，“art is a lie that tells the truth.”（[11]，经笔者稍微改动）

我们发现，

一些假话似乎比其他假话更“真”。例如，太阳系中的行星数为9这个命题是假的，但比太阳系中的行星数为90亿更接近事实；而“太阳系行星数在7到9之间”这一真命题比“太阳系行星数大于等于0”这一真命题更接近我们的探索要达成的目标（在这里即探索太阳系中行星的数目）。有些真理比其他真理更能实现我们的目标。最后，“行星的数量小于或大于9”这个命题毫无疑问是真的，但它反而没有它的严格否定“有9个行星”这一个假命题那样接近这一问题的全部真相（即恰好有8个行星）。有些假话甚至比某些真理更好地实现了我们探索真理的目标。

……

考虑一个并非数字的例子，当然它也是高度简化的，但鉴于最近基本概念地位的上升，它是相当具有现实意义的。假设你对关于哪些粒子是基本粒子的真理感兴趣。在探究之初，你所知道的是各种逻辑真理，比如同义反复：要么电子是基本粒子，要么不是。像这样的同义反复在帮助你找到关于基本粒子的真理方面几乎是无用的。现在，假设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Standard Model）实际上是在正确的轨道上。那么学习电子是基本粒子（为了举例，我们假设它是真的）就能使你一点点地接近你的目标。这决不是关于基本粒子的完整真理，但肯定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你继续了解到电子以及μ子和tau粒子是一种轻子，而且所有轻子都是基本粒子，那么你大概已经有点接近了。

如果以上是正确的，那么有些真理比其他真理更接近基本粒子的真理。

原子不是基本粒子，它们实际上是复合物体，这一发现取代了先前关于原子是基本粒子的假说。有一段时间，质子、中子和电子是原子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一命题被接受了，但不幸的是，它也被证明是错误的。不过，后一个假说似乎比它的前一个假说更接近事实（再次假设标准模型是真的）。而且，即使标准模型包含错误——因为它肯定也包含错误——它也可能比这些其他错误更接近关于基本粒子的真理。

因此，一些假的可能比其他假的更接近关于基本粒子的真理。

如果你从同义反复到电子、质子和中子是原子的基本成分这一假命题，你很可能已经向真理迈出了一步。

如果这是正确的，某些假话可能比某些真理更接近于真理。[12]

而且，我们还可以发见这样的情况，我揣测某人身高178.5cm，尽管他实际上的身高是178cm，但我已经很接近真了。

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的叙述/言说，总只能是一部分——因为我们相比起几乎无限的事实，我们是多么的有限——总是相对于某个整体来说的，总朝向着某个目标（goal）。当我们说“真相”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什么？是一个系统。不是一个命题两个真值要么真要么假。这涉及到不同系统的比较。例如当我们谈论的是是否是个骗子时，你无论说了再多ta以前是个好的人的事实，而不提及ta那一次骗人的经历，都是在刻意隐瞒；而甚至你可以承认这一次确实骗人了，可是那是ta迫不得已，事出有因，而ta从前是个好的人，就算不是在转移话题，也至少是在作一种解释阐释。考虑最简化的情况，我尝试运用一个算术例子，假设在语境之中我们谈论的话题有五个总体事实组成，假设它们一切情况都是持平的，那么它们各自的权重都是1/5，那么，当一个人说出了（是逻辑联结词合取）时，ta接近总体（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目标）的程度是；而E是我们言说的重点，它的加权为，那么一个人如果说出了，就算ta其它什么也没说，ta也完全达到了我们言谈的目标了。这里我们还没有考虑接近真话的假话（这时，这个假话的权重不会是或是一个负数，而会是一个正数），和使话题偏离原有方向的“无谓”的真话的情况（这时它的权重就不再是一个正数，而是一个负数了）。更详细的讨论可以参见[12]（但应该指出的是，我是独立想到这一话题，而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才发现了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SEP）的这一条目的，而着眼点也与SEP的不同）。

我还想提出的一点是，我们的叙述之所以“在根本上”达不到我们的目标，是因为我们的文字和表述是线性（linear）的——它像一条直线排列开来，后文是依赖（dependent）于前文的。可是世界是缤彩纷呈的，它是景色繁复的，换句话说，它是非线性（nonlinear）的。它直截铺展到我们的眼前。例如，当我们相继地说出“他爱着你”“我想要你”，这两个句子就好像有了某种关联，尽管这两个语句可能是独立的、无关的；当我想表达一个意义的析取（即是说，既可以是这个，也可以是那个——或者），我可能这样表达：她的脸就像雪/盐一样美丽。可是本来这应该是两个句子。现在因为这排列，人们看到一个时就看到另一个。伴随而来的那些习惯、联想就扑向了我们的大脑，我们不得不被它们所影响。永远不可能达到纯净如晶的原先想表达的那个意思。现在，我们明白了艾柯在《悠游小说林》里说的《约婚夫妇》为什么要写那么多明知普通人没兴趣的场景或是别的什么的描写，因为小说的厚度营造了一种间隔，它就是时间。在叙事学里，我们有故事时间、阅读时间（[8]，pp. 55-78），我们有一般读者、专业读者，我们也有理想读者——ta们被预定为能理解作者的意图（[8],pp. 10-20）。可是，谁说读者不是在创造呢？一部小说，它必得加上读者的阐释、想象，才算是完成。或是我写下一个词，“it's”，因为这样更好看，可是其实我想让它读作“it is”，“因为我总是更注重读音而不是实意”我就必须在它后面添上一对括号，加上注释，“读作“it is””，那么这就形成了一种打断，会让读者的思绪偏离出场景。这些结构上的难题。

因此，我们也或许能理解，为何文字和画面永远无法完整地表达对方，poem结构美。艺术中所表达的原始的主客未分的是超脱这种线性的一种尝试。

我们在逻辑中也许能看到另一种视角。在逻辑里，也有类似的问题。例如，在数学中，当我们写下是不一样的，后者是“一致连续”（uniform continuity）的定义。就像每个有基础逻辑和数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和是不一样的，前者只要求你对每一个都可以找到一个，后者则要求你要找到一个，对所有都可以，就好像每个人都有着一个ta爱的人，和有个人人人都爱ta，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因为在这些公式里，后面的依赖于前面的，假如是，就在的辖域（scope）里，我们要找的那个的值依赖于我们提前选定的的值，就好像，当你选好一个人时，你要找到一个爱ta的人一样。全称命题可以表示成，这里是一个函数符号，就好像函数的值依赖于的值一样，这叫司寇伦化（skolemization）。逻辑学家们想了办法，想要能够摆脱这种依赖性。例如，ta们想到，把公式前面的这些量词排成分列状：

[12]，或是用[13]，来表示并不依赖于，并配上相关的语义。

参考文献：

[1] Keats, John. The Poems of John Keats at the Internet Archive. Editor Ernest de Sélincourt. New York: Dodd, Mead & Company, 1905. OCLC 11128824, 194-195.

[2] Lee, M.-K, "The Theaetetu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lato, Fine, G.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411–436.

[3]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42.

[4] Heidegger. H,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Basic Writings: Ten Key Essays, plus the Introduction to Being and Time, David F. Krell (ed.), HarperCollins, 1993, 307-342.

[5] Heidegger. H, “On the essence of truth”, in Basic Writings: Ten Key Essays, plus the Introduction to Being and Time, David F. Krell (ed.), HarperCollins, 1993, 111-138.

[6] 莱昂内尔·特里林. 诚与真[M]. 刘佳林 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92.

[7] 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 译，译林出版社，2013.

[8] 翁贝托·艾柯，悠游小说林，俞冰夏 译，三联出版社，2005.

[9] 维克多·雨果，九三年，叶尊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20-148.

[10] 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石永礼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11] Picasso P., Scot Borofsky (ed.) , Past Masters: Picasso Speaks, 1923, in Picasso: Fifty Years of His Art by Alfred H. Barr Jr., published for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by Arno Press, New York, 1980, 270.

[12] Oddie, Graham, "Truthlikeness",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Winter 2016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URL =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16/entries/truthlikeness/>.

[13] Tulenheimo, Tero, "Independence Friendly Logic",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20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URL =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20/entries/logic-if/>.

[14] Galliani, Pietro, "Dependence Logic",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mmer 2021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URL =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21/entries/logic-dependence/>.